

保安开物业公司货车卖小区废品时撞伤人遇索赔。围绕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引发争议

公事还是私活? 职务行为界定待明晰

阅 读 提 示

大连一保安,在开物业公司的货车卖小区废品时撞伤人遇索赔纠纷。保安认为,自己卖小区废品一事物业公司知晓,且卖废品的钱上交物业公司,自己的行为应为职务行为,不应担责;物业公司则认为保安是开“公车”干“私活”。双方因此发生争议。记者调查发现,实践中,职务行为边界认定存在模糊地带,由此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本报记者 刘旭

2020年12月10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交通肇事保安贺军所在的大连某物业公司赔偿于女士医疗费、营养费等共计9225元。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执行完毕。此前,该案中“保安开物业货车卖小区废品”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引发争议。

职务行为的认定,涉及是企业还是员工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第170条规定,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发生效力。

一些用人单位的员工人数多、活动范围广,身兼岗位多、承担工作内容多,致使职务行为边界较为模糊、认定困难。《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企业或员工关于职务行为的纠纷时有发生。

因公还是因私起纷争

2020年3月7日13时,大连一小区居民于女士在回家路上被突然驶出的小货车撞倒,致腰部骨折。驾驶小货车的是小区物业保安贺军。经交警认定,贺军负事故全部责任。物业公司总经理垫付了医疗费和护理费共计2.6万元,同时表示,贺军是保安,不是小货车专职司机,是擅自开“公车”干“私活”,于女士的一切损失应由贺军承担,与物



业公司无关。

经鉴定,于女士为十级伤残,各类损失共计8.5万元。于女士委托律师起诉到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超出保险公司机动车强制险限额外的责任。

贺军表示,自己利用休息时间运送小区可回收废品,出售废品的钱上交给物业,并未塞进自己腰包,而且领导知道这事,从未表示过反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虽然贺军驾驶小货车外出卖废品不是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但其出售废品的钱上交单位,属于单位指派的临时性工作,为职务行为,故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于女士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损失。

在另一起围绕职务行为引发的争议中,沈阳专职司机王红双则败诉,承担了赔偿责任。

王红双是沈阳某电商行业企业总经理的专职司机。2020年1月14日,王红双在接领导上班之前,送儿子去补课。7时15分,他在驾车途中撞翻一辆货车,致货车司机右小腿骨折,货物损失近4万元。

面对赔偿,王红双认为,自己是在接领导途中出了事,应当是职务行为。公司则认为,王红双送儿子补课不是工作内容,是个人行为。

2020年10月22日,法院在调解中认为,

王红双是在非工作时间从事非工作内容,因此不是职务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沈阳市一位经常审理劳资纠纷案件的法官郑虹表示,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中行为人往往公私掺杂,很难明晰认定是否属职务行为。

“公事”的边界并不明晰

目前,针对员工哪些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我国法律、法规中没有作出明确界定。

郑虹表示,这给相关案件的审判带来了难度。因为职务行为不能单单以工作时间和空间来判断,还要综合考虑行为人为人的内容、场合、行为之名义及行为的受益人、是否与用人单位意志有关联等等。尤其是利用职权办“私事”或者私人时间非工作地点办“公事”,很难认定,实践中出现过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据介绍,在贺军案件的庭审中,物业公司拿出保安管理制度和贺军的劳动合同指出,保安工作内容为着装值勤、巡逻、按规定开关大门、制止车辆乱停放、做好辖区内的保洁和绿化养护等,没有收集售卖废品一项。劳动合同中也没有这项。

“除了执勤和巡逻,保安的临时指派活不少,比如处理业主噪音投诉、帮忘带钥匙的业



法治景观进公园

1月3日,市民在河南省夏邑县法治公园法治景观旁游玩。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法治公园是该县进行法治景观建设,打造具有夏邑特色的一所法治文化公园。

苗育才 摄/视觉中国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前夕,公安部亮出2020年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绩单”

去年全国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25.6万起

本报记者 卢越

在1月10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前夕,公安部亮出2020年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绩单”——2020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3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亿条,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

当前,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持续高发,已成为上升最快、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突出犯罪。针对贷款诈骗、刷单诈骗、冒充客服诈骗、杀猪盘诈骗等四类案件多发高发的情况,各地公安机关捣毁一大批诈骗窝点,抓获一大批违法犯罪嫌疑人,刷单诈骗案件占比由去年年初的25.3%下降至13.8%,贷款诈骗、冒充客服诈骗、杀猪盘诈骗等高发类案件得到明显遏制。

近年来,借助即时通信工具实施的网络诈骗、赌博等新型犯罪案件持续高发,造成人民群众财产重大损失和国家资金大量外流,极易引发社会风险。

2020年6月,江苏徐州公安机关打掉一个为网络诈骗、赌博等犯罪提供即时通信工具账号“养号”、交易的特大黑产平台——“小果平台”,该平台注册会员达14万余人。

该案中,不法网站平台通过养号、办卡等方式规避实名制,为诈骗、赌博等下游犯罪提供帮助,形成了庞大的黑灰产业链条。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84名,串并各类网络诈骗案件1300余起,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该案是全国公安机关侦破的涉及账号最多、涉案金额最大、危害影响最深的同类型案件。

针对此类违法犯罪链条化、分工精细化的特点,全国网安部门在“净网2020”中严厉打击向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水军等突出犯罪提供“网络黑”“手机黑卡”的违法犯罪行为。2020年1月至11月,公安机关查处关停网络接码平台79家,抓获非法交易手机黑卡、网络黑号人员2000余名,扣押手机黑卡和联网卡1700余万张、网络黑号2.4亿个,打击黑产硬件、软件制售团伙22个。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背后,往往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形成了非法获取、买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色产业链,助长了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非法讨债催收等违法犯罪活动。

2020年6月,辽宁网安部门接到多位市民反映称,自己在购房后,从房屋登记环节开始,直至房屋装修、购置家具的整个过程中,不断接到从装修公司、建材销售商等打来的推销电话。

主介绍开锁匠,我觉得物业公司刻意缩小了实际上的工作内容。”贺军说。

员工午休时为部门领导和同事买奶茶、销售员陪客户吃饭损坏餐馆财物、员工购买“贿赂”所用礼品……记者随机采访18位保安、保洁员、快递员、前台接待员、客车司机、销售员等,他们均表示,用人单位经常会指派工作主业以外的临时工作,或者上级领导利用职权委托员工办理“私事”。对于这些事,3人认为是职务行为,3人表示不是职务行为,其余12人表示不好判断。大部分员工对是否为职务行为都不说不清楚。

民法典给出立法导向

民法典第1191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这实际上是对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作出的规定,对于‘什么是职务行为,如何界定职务行为’,则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郑虹说。

民法典第1191条规定同时表示,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郑虹认为,这是立法导向,表明尽管企业要担责,也不能要求企业法人对其工作人员所有致人损害的行为都承担责任,这样不合理也不现实。因此,应尽快出台系统清晰的具体规定,统一认定标准,平衡企业、员工、被侵权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更具合理性。

根据民法典第998条规定,认定行为人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

在审理类似案件中,郑虹结合客观证据和主观判断,总结出一套可执行的标准。即,行为入是否享有职权、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是否以“工作”或“职务”名义实施、实施行为的目的是否是为了雇主的利益或者为了便于履行职务。

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海提醒企业和员工,工作之前明确职务行为范畴,才能更好地保护劳资双方利益。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为化名)

深圳将出台国内首部

数据领域综合性地方立法

首提“数据权益”保护,禁止利用大数据“杀熟”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2020年12月28日,广东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这是我国首部数据领域的综合性专门立法,首次提出“数据权益”保护,明确规定收集、处理涉及隐私的个人数据须得到明示同意。

大数据已应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催生新的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的同时,也给保护好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利益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平衡促进数据经济发展与个人数据尤其是涉及隐私的数据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深圳此次立法的重点。

《草案》规定,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享有对特定数据的自主决定、控制、收益和利益损害受偿等数据权益,这也是在国内立法中首次提出“数据权益”保护。收集、处理个人数据应当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其中,涉及隐私的个人数据应当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明示同意,即必须是通过书面、口头等方式主动作出声明或者自主做出肯定性动作予以明确授权同意。自然人还有权随时撤回被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的同意。撤回同意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者要对数据及时删除。但是,不应影响在撤回前基于同意作出的合法数据处理。

结合深圳新冠疫情情报工作经验,《草案》还规定在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企业正当利益等情形下,可以无须征得个人同意收集处理自然人数据。

《草案》提出建立公共数据共享负面清单制度。政府各部门掌握的公共数据资源蕴藏着巨量的经济信息,通过增值开发不仅可以给市民带来便利,也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草案》通过一系列创新规定,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公共数据深度开放、全面共享。

近年来,涉及企业数据权益法律纠纷层出不穷,企业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草案》明确经营性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其他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数据,对其产品产生实质性替代。

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大数据“杀熟”,《草案》规定,经营性数据要素市场主体不得通过分析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消费记录、偏好等数据,对商品或者服务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最高检

惩治窨井盖犯罪守护“脚底下的安全”

本报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5件涉窨井盖犯罪典型案例,指导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涉窨井盖刑事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窨井盖虽小,但关系到人民群众‘脚底下的安全’,干系重大。”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厅长元明介绍,2020年3月,由最高检牵头,会同最高法、公安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最高检还就窨井盖管理问题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了“四号检察建议”。

据统计,该指导意见印发后,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有18个省份办理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共批捕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26件29人,起诉25件33人,开展立案监督1件,涉及罪名包括破坏交通设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加强与公安、法院、行政执法机关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打击合力。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切实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依法惩治涉窨井盖普通刑事犯罪和职务犯罪,形成有效震慑,为推进“四号检察建议”有效落地,增强检察建议刚性,提供有力保障。(法文)

吉林

杜绝临时工参与行政执法活动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经审议通过的《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提出坚决杜绝临时工、公益岗位人员参与行政执法活动,并为执法人员设定了“行为禁区”,粗暴野蛮不文明执法、不履行法定职责或不按法定程序进行执法等行为都将受到追究。

据了解,针对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不严格、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条例》进行了重点规范。对行政违法或者不当、以权谋取私利、粗暴执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各种情况,分别规定了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离岗培训、调离或者建议调离行政执法岗位、暂扣或者收缴行政执法证件等处理;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存在严重问题的,规定了对该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的监督方式,涉及违法犯罪的,按照规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临时工执法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此,《条例》做出明确规定:从事执法工作必须具备行政执法人员主体资格,依法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坚决杜绝临时工、公益岗位人员参与行政执法活动。

湖北枣阳

法院驳回股东对正常运转公司的解散诉求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梁军)5名股东因对公司经营管理意见相左,要求解散运转正常的股份公司。2020年12月23日,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仅使公司免遭解散,还维护了150余名员工的劳动权。

2002年6月25日,袁某某等11位自然人发起成立了枣阳市三杰麦面有限公司。近年来,因股东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方面产生了分歧,袁某某等5名股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公司。承办法官了解到,三杰公司现有员工150多人,一直正常经营。该公司为疫情以来枣阳市第一批复工复产企业,1~5月利润创历年来产量销量最高水平。如该公司解散,员工将面临失业。为此,承办法官多次进行调解,释明法律和分析利弊,因各方意见分歧较大而未能达成共识。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三杰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法院本着“公司自治为主,司法谨慎干预”的原则,认为5原告诉请解散三杰公司不符合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对其主张不予支持。